

后殖民

[英]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

杨乃乔等译

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

后殖民批评

(英)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
杨乃乔 毛荣运 刘须明译 杨乃乔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朗文批评系列读本”总编辑前言

当代批评理论概况，现在常被作为文学研究学位课程的主课。各种理论的具体发展都曾体现了文学批评的整个变迁。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福柯理论为莎士比亚研究带来革命，“解构”使浪漫派诗歌被完全重新评价。几乎没有哪一个文学时期能够得以逃脱女性主义批评的犀利批判。从事文学研究的教师再也不能死守那种标准的、公认的研究方法了。

教师们在迅速变化的批评环境下都渴望得到指导材料。他们需要了解文学理论的最新动态，尤其需要领会潜藏于理论性新读物中的某些新理论所具有的实际影响力。本系列的多种丛书把有关理论的重要文章编集成册。然而，若要全面抓住某些理论的意义和可能的用途，关键还在于观察它们的实际表现。本系列丛书以易懂的形式和一定篇幅的导读文字向大家呈献内容充实的多本新读物。

每本丛书都有一篇内容实在的序言，此序言探讨所收选文章反映的理论问题和冲突，指出不同见解之间的分歧所在。现在必须把理论多元化摆到文学研究的日程表上来了，我们不能再佯装我们都在默默接受同一种文学研究路套的姿态，视而不见不再能站得住脚。文学院系需要超越仅对理论差异持容纳的态度：单单容许分歧是不够的，还需把那些差异“搬上舞台”。本系列的各本丛书都欲努力生动地描绘那些差异，这并非一定意味着要解决其中的矛盾，而是着重于把不同的理论做出的选择提到突出地位，或提出走出那些由差异所形成的僵局的路径。

理论“革命”已获得实际的效果。它已使传统的经验主义和浪漫主义关于语言和文学的假说开始动摇。正在被推举的文学研究的新日程表究竟是什么，这并非总是很明确，而且后结构主义已在理论上对“文学”的概念本身提出了诘问。然而，当我们看到最好的理论家们

已在实践中把当代理论的那些不确定性和晦涩性做了怎样的处置时,就会知道它们的前景似乎并不怎么令人担忧。本系列丛书的目标是传播近来的最佳批评,并展示有可能以新的、挑战性的方式重读经典的文学文本。^①

莱曼·赛尔登(Raman Selden)

斯坦·史密斯(Stan Smith)

出版人和系列丛书编辑同仁在此沉痛公告,莱曼·赛尔登于1991年5月溘然病逝,享年53岁。莱曼·赛尔登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和令人爱戴的人。所有曾与他共事过的人们都将怀着深情和敬意怀念他。

^① 按:《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为当下在欧美学术界流行的理论丛书《朗文批评系列读本》(*Longman Critical Readers*)之一,由英国学者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加雷斯·斯坦顿和维莉·玛丽选编并撰写述评,朗文出版公司1997年第1版。本书根据1997年第1版译出。

鸣 谢

我们感激下列个人和机构惠允我们取用他们版权的材料。

作者齐努瓦·阿切比的代理人,他们惠允我们节选收于《希望与障碍:1967—1987年论文选》中阿切比的文章《非洲的形象:康拉德的〈黑暗的心灵〉中的种族主义》;哈泼·科林斯出版人集团与格鲁弗·魏登费尔德惠允我们采用收于《世上的不幸者》(1955,由麦克吉彭和吉初版)一书的弗朗兹·法依的文章《论民族文化》;每月评论基金会惠允我们节选艾梅·赛萨尔的《关于殖民主义的话语》(约翰·平克姆英译)一文,该文版权属于每月评论出版社(其初版为“*Discourse sur le Colonialisme*”,巴黎,现代非洲人出版社,1955);《牛津文学评论》的编辑者惠允我们采用载于《牛津文学评论》(1991,第13卷)由罗伯特·扬编辑的《新殖民主义》专号中霍米·巴巴的文章《“种族”、时间与现代性的修订》;牛津大学出版社惠允我们采用收于《少数族话语:文化评论的实质和语境》(1992,第6—7期)阿卜杜尔·简穆罕默德和大卫·劳埃德的文章《论少数族话语的理论:目标是什么?》;作者爱德华·赛义德的代理人惠允我们采用载于《埃塞克斯文学社会学会会议文献汇编》(1985年7月)的会议发言稿《东方主义的再思考》,该文版权(1985)属于爱德华·赛义德,初版于《种族与阶级》1985年秋季号,由威利业务公司惠允重印;作者加亚特里·查克拉沃尔蒂·斯皮瓦克教授惠允我们采用她的文章《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该文载于小亨利·路易斯·盖茨编辑的《“种族”、书写及差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6)一书;特那朗德出版有限公司惠允我们采用蓓尔·赫珂丝载于《黑色的外表:种族与再表述》一书的文章《革命的黑人女性:自己争取成为主体》;维索与新左派图书有限公司惠允我们节选艾贾兹·阿赫默德的《理论思考:阶级、民族与文学》一文,该文版权(1992)属于维索与新左派图书有限

公司。我们一直没能够找到戴安娜·布莱顿和海伦·蒂芬载于《小说的殖民消解》一书中《西印度群岛文学与澳大利亚文学比较》这一文章之版权持有人,也无法找到霍米·巴巴的行踪。

我们希望有人能够为我们提供线索。

我们还要对玛丽雅·麦克唐娜在我们编辑此书的过程中给予我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目 录

“朗文批评系列读本”总编辑前言

- 莱曼·赛尔登 斯坦·史密斯(I)
- 鸣 谢 莱曼·赛尔登 斯坦·史密斯(II)
- 译者序: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批评的学缘谱系追溯 杨乃乔(1)
- 导 言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49)
- 关于殖民主义的话语(节选) 艾梅·赛萨尔(138)
- 论民族文化 弗朗兹·法侬(159)
- 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康拉德《黑暗的心灵》中的种族主义
..... 齐努瓦·阿切比(180)
- 东方主义的再思考 爱德华·赛义德(195)
- 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 加亚特里·斯皮瓦克(221)
- “种族”、时间与现代性的修订 霍米·巴巴(249)
- 西印度群岛文学与澳大利亚文学比较
..... 戴安娜·布莱顿 海伦·蒂芬(281)
- 革命的黑人女性:自己争取成为主体 蓓尔·赫珂丝(309)
- 论少数族话语的理论:目标是什么?
..... 阿卜杜尔·简穆罕默德 大卫·劳埃德(331)
- 理论思考:阶级、民族与文学 艾贾兹·阿赫默德(346)
- 西方后殖民批评重要作者简介 (372)
- 西方后殖民批评推荐阅读物 (376)
- 后 记 杨乃乔(396)

译者序：

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批评的学缘谱系追溯

杨乃乔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大陆汉语语境下,文学的叙事在遭遇后现代工业文明所获取的命运是极为惨重的,社会的转型把文学在 80 年代所承揽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从叙事的思想深度中抽取出来,彻底地淡化到后现代的消费文化中去,使文学仅残留下一道形式本体的踪迹;因此依赖于文学叙事而生存的文学批评也只有从残留的文学踪迹那里离去,退向一种比文学外延更大且意义更小的文化批评。不错,90 年代文化批评的崛起昭示了大陆同期知识分子跌落于文学批评缺失后的最后思想挣扎,也透露了他们在思想最后挣扎中的学术务虚。虽然文化批评在形式过大意义过小的空间中远离文学解读的个案研究,意外地制造了一系列泡沫学术,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文化批评使大陆同期知识分子在 90 年代大规模接受从西方后现代主义之后再度泊来的后殖民批评成为可能的原因之一。

在文化批评与文化抵抗的策略上,崛起的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与“二战”之后的新殖民批评(neo-colonial criticism)一脉相承,前后两类批评者均是立足于种族、性别与阶级这三个层面上,对西方宗主国的经济侵略与文化侵略进行意识形态的抵抗。在新殖民批评与后殖民批评的原创语境那里,种族、性别与阶级这三个层面反照了从新殖民批评与后殖民批评所扩散出去的在意义与逻辑上相维系的东西方整体文化背景,所以文化成为这两类批评的主要指涉文本。从前后两类批评主体的种族与文化身份上来划界,新殖民批评者是以来自第三世界非洲的齐努瓦·阿切比(Chinua Achebe)、艾

梅·赛萨尔(Aimé Césaire)与弗朗兹·法侬(Frantz Fanon)等为代表人物,他们是来自尼日利亚与马提尼克岛的黑人批评家,而后殖民批评者是以来自第三世界亚洲中东的爱德华·W. 赛义德(Edward W. Said)、加亚特里·查克拉沃尔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霍米·K. 巴巴(Homi K. Bhaba)与艾贾兹·阿赫默德(Aijaz Ahmad)等为代表人物,他们是来自巴勒斯坦与印度地区踞守伊斯兰文化背景的批评家。后殖民批评刻意强调把解构主义的“差异”理论带入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文化中,划出对立的鸿沟,从而给出东西方文化相对的差异性界说。在这里,如果我们也把新殖民批评者与后殖民批评者在现象上共属的文化身份置放在“差异”中来考量,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新殖民批评者与后殖民批评者他们都来自第三世界,都是对西方宗主国经济与文化侵略的抵抗,但所不同的是新殖民批评者大都来自非洲大陆,而后殖民批评者则来自亚洲大陆的中东地区,令人深思的是,最终他们都以激进的反调之声而获取第一世界白人学者对他们的另类瞩目,并在宗主国大学获取显赫的教席和永久居住权。在这个意义上,以少数族(minority)或非主流(subaltern)的身份从边缘向中心的递进是他们的共同策略。

后殖民批评在中国大陆汉语文学界已喧嘩了近十个年头了,当代文学批评需要快速的节律调整,以适应这个时代文化与知识的膨胀速度;9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家喻户晓失去了新鲜感,大陆的众多学者急切地渴望採用一套新的理论话语指向文学批评,因此在西方延留已久的后殖民理论伺机进入东方中国大陆,最终变体为一种具有相当防卫性的民族主义文学批评。关键问题在于东方大陆的汉语文学界,虽然后殖民批评已成为后现代理论之后的另类热点话语,但很少有人人在严谨的学缘谱系上追问后殖民批评的起源问题,如果我们必须从学缘发展的脉络上反思、追问后殖民批评究竟始于何时,来自第一世界最恰如其分的回答则是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巴特·穆尔-吉尔伯特(Bart Moore-Gilbert)在《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一书《导言》中所给出的两位学者的对话:

对于艾拉·肖哈特(Ella Shohat)提出的“‘后殖民’究竟始于何时”的问题,阿利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曾不客气地答道:“始于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到达第一世界学术圈时。”^[1]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阿利夫·德里克的回答来自他所写的《后殖民氛围: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这篇文章。^[2]

关于阿利夫·德里克有关后殖民批评缘起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到达第一世界学术圈之时”的表述,我们不认为这是一种纯粹学理意义上的学缘谱系之原始,但德里克的表述的确最为内在地揭示了后殖民批评者(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以强硬的反调之声在第一世界获取西方宗主国知识分子对其关注的微妙心理,因为美国是一个接受差异存在的多元种族社会。严格地讲,后殖民批评绝然不是从一种文化零度中陡然崛起的新潮理论,在学缘的血脉维系上,后殖民批评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扩张及“二战”后东西方对峙于冷战状态下的殖民批评、新殖民批评与非殖民化(decolonize)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毫不苛求地说,如果我们不在更深的文化背景上对“殖民”与“殖民主义”这两个概念做一次超越普级知识的诠释,我们无法在一种比较的视野中切摸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批评的命脉,而导致自己处于一种概念的误读与误用的窘态。

不错,对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批评的思考应该从帝国主义(imperialism)、殖民主义(colonialism)与扩张(expansion)这三个众所周知的概念释义开始。

就在西方学者相关专业经典著作中的寻检,“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在学术上的自觉起用最早源起于法国,在《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欧洲扩张历史论文集》的《前言》中,美国学者H. L. 威斯林曾这样做过一次学缘的谱系追溯:

“帝国主义”这个词有一个如此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以至曾经有一部著作在全文中给予专门的论述。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词在19世纪法国的发生。在19世纪的法国,这个词涉及跨过英吉利海峡之前的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与第二帝国(Second Empire)的政界朋友们,这个词被用

于关于大不列颠帝国未来的争论。就是在1902年，J. A. 赫伯森(J. A. Hobson)出版他的著作《帝国主义：一种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帝国主义”这个词发展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概念。从那个时代，在字面上这个词已经涉及殖民剥削的一种特别形式，这种殖民剥削的特别形式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有着密切联系。从那个时代开始，这个概念不仅在政治论辩和学术讨论中成为一种流行的话语，并且一直存留至今天。根据《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这个概念最初不仅涉及企图建立或保留正式的主权以施加臣属的政治社会，而且这个概念也经常相应涉及一个政治团体施加于另一个政治团体的政治控制或影响而产生任何形式的行为。”[3]

我们在这里姑且相信 H. L. 威斯林对“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追溯，但是我们同时也相信帝国主义现象远先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在学术上的自觉使用。在近现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史上，“帝国主义”作为一个自觉的学术概念，是一个仅有大概两百年历史但霸权意识却积淀深厚的术语。帝国主义主要是通过武力的主权施加与经济侵略，在扩张中从而完成对臣属国的政治控制。当然，帝国主义主权的境外扩张必然表现为种种的殖民形态，所以殖民必然成为帝国主义主权向境外扩张的副产品。那么“殖民”与“殖民主义”之间又有一种怎样的逻辑维系呢？在该书的《前言》中，H. L. 威斯林又继续给出他的学缘谱系追踪：

虽然殖民(colonization)已经由来已久，但是作为姐妹概念，殖民主义(colonialism)则是一个后起的术语。然而，殖民是一个技术术语，在原初意义上，仅仅用于描述人们迁移到世界其他地方并在那里展开新的定居生活的现象。正如帝国主义一样，殖民主义源起于法国，在法国这个术语第一次使用于一本题目为《殖民主义》(*Le Colonialisme*)的著作，这部著作由法国社会学家与反殖民主义者(anticolonialist)保罗·路易斯(Paul Louis)撰写于1905年。据《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所引：“现在殖民主义已经被认为与统治不同种族的人们有关联，这些不同种族的人们栖息于被来自帝国中心的大海所分割的土地；更为特别的是，这意味着受欧洲国家的直接政治控制或受那些由欧洲人所操纵之国家的直接政治控制，如美国或澳大利亚，统治其他种族的人们，特别是统治亚洲人与非洲人。”[4]

学缘谱系的追踪无疑是学者在反思中的陈述行为。从H.L. 威斯林的反思中我们可以见出,虽然殖民现象由来已久,但“殖民”在原初意义的使用上则是一个没有情感价值评判的纯粹技术术语,是中性的。但随着帝国主义主权的扩张,及其主权行为在价值取向上向霸权行动的转换,“殖民”这个概念则被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在仇恨中带着一种贬义色彩给予反复的表述。如果我们的思考带着一种精密的追问逻辑,我们不难发现,其实H.L. 威斯林的学缘追踪已经给予我们一种启示了:当东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在后殖民批评的语境中关注赛义德、斯皮瓦克、巴巴与阿赫默德等人,艳羨他们在欧美学术界採用纯正的英语向西方中心主义挑战时,这种关注与艳羨多少使我们沉溺于英语的话语权力收获了一种普泛的迷误,以致我们在学缘谱系上忘却了“正如帝国主义一样,殖民主义源起于法国”,同时,在学缘谱系上忘却了“在法国这个术语第一次使用于一本题目为《殖民主义》的著作”,也更忘却了“这部著作由法国社会学家与反殖民主义者保罗·路易斯撰于1905年”。也就是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化事实,还是作为一种学术现象,均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法国有着维系。然而,法国曾经经历过的这一切,却被当下英语在西方世界的普泛言说权所遮蔽了。有趣的是,来自东方亚洲中东的学者在欧美学术界以后殖民批评抵抗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权力话语时,他们採用的哲学策略是法国学者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科的权力批判理论。

主体——人在採用一种语言进行文学批评的叙事时,这种语言往往把主体浸润于产生这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及价值判断中,所以批评主体的自我判断在这里只能奴役为一种附加值,陪衬着语言的文化价值共同奏效。也正是在这一学理的意义,中国大陆学术界对西方后殖民批评及其理论接受,更附着于英美而忘却了法国。实质上,无论是新殖民批评还是后殖民批评,这两股思潮在文化与文学的前后承继关系上,与法国思想界有着必不可缺的血脉维系。

“文化大革命”终结之后,东方中国大陆带着这个民族整体的心理创伤步出现代宗教运动——“文革”的阴影,中国知识分子把求反

思与求发展的视野透过第二次启蒙的思想平台投向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在文化与文学批评中对东方中国大陆的渗透,推动了大陆学术界人文主义精神的崛起;而在90年代,由于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侵入,把中国特有的文学精英性缓释于大众文化的媚俗性中,再叠加上90年代的经济大潮及后现代工业文明对中国大陆公共生活的弥漫和冲击,终于在后殖民批评的启示下,大陆学人开始领受民族主义的责任感,感受到西方经济与文化扩张的危机,自觉或不自觉地触摸到这种扩张隐蔽在话语权力下的西方中心主义。其实,当下大陆学术界所奢谈的西方中心主义及围绕着这一概念所拒斥的文化在本质上就是“扩张”。

东方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古老历史,但在走向国际文化舞台时却扮演着一个迟误的他者(other)形象。关于第三世界非洲新殖民批评与亚洲中东后殖民批评中的“迟误性(Belatedness)”理论,霍米·巴巴在《“种族”、时间与现代性修订》一文中借用法依的“暂存性(temporality)”概念,也言及第三世界文化走向世界的迟误性:“这就是法依所突出的暂存性——他的《黑人的迟误性》(‘Belatedness of the Black’)的感觉——没有简单地对黑人身份提出一个不恰当的本体论问题,也没有莫名其妙地使本体论的问题不可能理解现代世界中的人类:‘你们来得太迟了,迟误得太晚了,将永远只有一个世界——一个在你们与我们之间的白人世界。’”[5]

是的,在东西方文化对话的世纪转折期,中国文化及其历史是以女性形象的扮演者而姗姗迟来,并且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中表现出接受与退守的弱势;的确,在80年代与90年代中国大陆汉语文学批评界,只有第一世界的白人理论在言说。在国际文化舞台上,从历史上来看视“扩张”,从不属于东方的中国。正如在《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欧洲扩张历史论文集》的《前言》中,美国学者H. L. 威斯林把“扩张”追溯于欧洲,又把欧洲的“扩张”定义于与法国平起平坐的另外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

最后,欧洲“扩张”这个概念由来自于英国。1884年,约翰·斯利(John Seeley)在剑桥大学做了一系列关于《英格兰扩张》(Expansion of

England)的学术报告。后来,这些学术报告在同一命题下出版成书。当然,“扩张”这个概念作为一种隐喻,来源于物理学领域对种种物体膨胀的描述。就约翰·斯利而言,与其说英格兰是一个扩张体或不如说英格兰是一个扩张的社会。[6]

当我们在这里清理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扩张”这三个众所周知的概念在西方文化史及学术史上的发展脉络后,我们并不企望从经济和政体的视角来展开我们的论述,我们只是为文化与文学上新殖民批评与后殖民批评的探究,铺垫一方思考的平台。

也就是说,自从殖民地作为一种经济形态与文化形态存在于这个世界,文学必然以其审美的叙事把种种殖民现象结构于文本中给予评判,并以感性的书写在观照这一现象中提升一种价值判断的理念。需要说明的是,倘若我们从宏观的视角给新殖民批评与后殖民批评划出一个地域的界限,我们或许可以从文学地域学中得到一种学缘谱系上的启示:新殖民批评主要肇源于第三世界的非洲,以及非洲与西方宗主国在殖民关系中所结成经济、政治与文化维系;而后殖民批评主要肇源于第三世界亚洲的中东,以及亚洲中东与西方宗主国在殖民关系中所结成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维系。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收获一种比较,即新殖民批评与后殖民批评作为理论话语都可以归属于第三世界及第三世界对西方宗主国扩张的拒绝,但前者肇源于非洲,后者肇源于亚洲,前者在批评上更多的是指向文学与政治,后者则把文学批评与政治批评扩大化到文化与宗教的背景中。

北美殖民地文学与基督教神学

在《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欧洲扩张历史论文集》一书中,虽然H. L. 威斯林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扩张”在学理上的讨论做了溯源,但是我们认为,殖民文化的发生远远早于H. L. 威斯林在学源上所追溯的谱系,也如同文学现象的萌发态势远远早于文学批评在理论上所采用的那怕是最早的“文学”概念等一系列学术话语。所以,在此必须提及的是,殖民文学作为殖民经济与殖民文化的精神副

产品,无论是零散还是大规模的生成,远远早于H. L. 威斯林关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扩张”在理论上的探问。其实,殖民文学的发生与美洲大陆的发现及欧洲人向北美大陆的早期移民、拓荒、传播基督教教义有着内在的文化维系。17世纪以来的北美大陆是世界文学史上大规模殖民文本书写与殖民文学现象的孳生地,东方中国大陆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教学对西方殖民文学现象的疏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由于国内学界对国外殖民文学的研究基本处于真空状态,并且没有起码的材料准备与积累,因此,我们在溯本追源中清理后殖民批评时对殖民文学的反思,也处在一种举步维艰的境地。但是,至少美国盖尔研究公司(Gale Research Company)出版的大型系列丛书《文学传记词典》第24卷《北美殖民地作家 1606—1734》与第31卷《北美殖民地作家 1735—1781》(为我们提供了整部文本的关于北美殖民地时期作家的学缘谱系。〔7〕

由于当下东方中国大陆学界对后殖民批评的接受是从一种偏执的视角完成的,所以在西方学界原初语境下崛起的后殖民批评在东方中国大陆学界变体为一种保守的民族主义批评思潮。再由于后殖民批评在中国大陆学界的变体及变体所营造的使人无法规避的批评语境,可能会导致当我们走进西方殖民文学与殖民文学批评所构建的原初语境中时,会获得一种在理论与美学价值评判上截然相反的学术休克感。

美国学者艾默利·艾利特在《北美殖民地作家 1606—1734》前言中曾给出过一段被美国学界认定的综述:

从19世纪早期以来,当第一批美国殖民文学史与早期美国文学史开始产生时,批评家与历史学家曾经哀叹早期美国文学遗产的贫瘠,把美国文学写作不成熟的窘困与当代英格兰、苏格兰诗歌作品的雅致比较,批评者提供了种种借口,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作为文学艺术家的失败。其中一个论据是,殖民者一直忙于拓荒,一直忙于法律、政府、学校和商业的建设,没有把时间与精力投入纯文学(belles-lettres)。另一个论据是清教徒主义(puritanism)在文化中拥有一种强大的势力,以致种种反对想像放任的规定和走向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限制,压制了美学的成就,仅仅

恣愿了呆板与说教形式之文学的产生。接下来的原因是，在新英格兰由于神职人员通常控制着出版业，并且他们又是写作世界的主人，在北部殖民地，传教是唯一通向公众的文学形式。关于说明在中部殖民地与南部殖民地极小量的文学产生，存在一种既成的解释，即气候与地理不支持文化中心的创造，或者没有赋予文学的产生以一种充盈的精力。当这些借口不充分时，总是有一个辩解，即绝大多数殖民者是文盲和穷人，他们是欧洲的贱民。所以令人信服的是这样一种描述，一代代美国人是被这样教育的：美国文学真正开始于拉尔夫·奥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散文与霍桑(Hawthorne)及梅尔维尔(Melville)的故事。[8]

当下中国大陆学者关于后殖民批评的展开，在理论主体的形象设计上均以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先把自己定位于后现代世界秩序的边缘，再以一种对殖民或后殖民的抵抗张力来证明无论殖民者还是后殖民者都获有一种释放霸权的欲望。当然，目前中国大陆学界还没有在学缘谱系上把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文学、殖民文化与后殖民文化、殖民批评与后殖民批评链接在一种学源探索中，打通三者先后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我们作为东方中国大陆学者囿于有限的知识获得，带着在汉语语境下变体的后殖民批评的激进，看视艾默利·艾略特在上述《前言》中的陈述，我们会在一种截然悖立的价值比照下获取三个启示。

第一，在艾默利·艾略特看来，早期北美大陆的殖民者并非完全是掠夺者，他们可能是文盲和穷人，是来自欧洲的贱民。在早期的殖民拓荒者诗意的种种形式书写中，我们似乎还找不到那种暴富的殖民者在短期脱贫中傲慢出的经济霸权与话语权力。如北美殖民地时期女作家安娜·布莱特斯端特(Anne Bradstreet)，就当代美国奎英斯学院(Queens College)学者温迪·马丁(Wendy Martin)对她的研究证明，安娜·布莱特斯端特的良好教育不是来自学院，而是来自她的父亲：“安娜·布莱特斯端特被认为是成熟的新世界诗歌中的第一位女性。1650年，她的诗歌集《在美国最新崛起的第十个缪斯女神》(*The Tenth Muse Lately Sprung Up in America*)在伦敦第一次出版时，得到了为数众多的赞许性关注。……至今她仍然被认为是北美殖民地早期诗人中最为重要的作者之一。虽然她没有进过学校，但她从

她的父亲那里受到过良好的教育。”^[9]在关于安娜·布莱特斯瑞特的文学传记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位女性因拓殖时期的草创而无法步入学院与无法走进知识的愚昧,及一位女性于潜在的性别歧视中所透露出的不可遏制的才华。

第二,在艾默利·艾略特看来,北美殖民地文学并非是一种纯文学写作,更多是以书写镜照早期殖民拓荒、殖民经济与殖民商业道德等现象。就美国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学者罗伯特·D.阿纳(Robert D. Arner)对早期北美殖民地文学作家乔治·奥尔斯普(George Alsop)的评价而言,与其说这些书写文本是“文学”,不如说更多的是在“文学性”中成立自己的价值:“乔治·奥尔斯普是殖民时期北美最具讽刺性作品之一的作家。《马里兰省的一位人物》(*A character of the Province of Maryland*)直接写成于他本人做契约佣工时的体验。这部著作是散文与诗歌结合在一起,创造了马里兰作为等待开发之处女地的形象,这部文本直接或间接地讨论了大量的关于马里兰经济命运的主题,包括萨斯奎哈纳印第安人(*Susquehanna Indians*)、英国政治与商业道德。”^[10]需要注意的是,文学理论应该在“文学”与“文学性”这两个概念之间置放着一条分水岭,“文学”是在一种纯粹的审美书写中所结构的意象文本,这种意象文本是一种纯文学写作,而“文学性”仅是给非文学书写下意识地铺垫上一种情感的色彩。我们说,北美殖民地文学中的一部分文本并非是纯文学写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我们的观点。

第三,在艾默利·艾略特看来,与殖民拓荒者同步移民于北美大陆的基督教文化,在本体论上对殖民拓荒者给予信仰的控制,以及基督教教义在公共社区的布道对殖民文学写作中的美学成就产生了压制,书写往往是把基督教教义的道德说教固化在文本中。其实,就最后一点来客观地评估,艾默利·艾略特在《前言》中对北美殖民地文学发生的描述带有一种反基督教文化的色彩。就从我们从本体论与生存者安身立命的信仰价值评判来看,对于那些从欧洲向北美大陆移民的早期拓荒者来说,基督教在信仰安身立命的本体上,为他们在困境中的生存与拓殖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基督教在信仰的本体上成为拓荒者的精神支撑点。甚至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后,基督教为废除